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二〇期 ——  
(二〇〇九年十月五日出版)

---

本期目录 (zk09010a)

---

- 【国史论衡】 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陈家琪  
【史学动态】 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下) 余汝信
- 

小启: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 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 <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mailto: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

#### 【国史论衡】

我们依旧期盼着另一种形式的“文革史”  
——我读《“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 陈家琪 •

购得卜伟华先生所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国史六卷”:《“砸烂旧世界——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 已经有半年多的时间了。迟迟没有看的原因, 恐怕主要和自己的某种心理期待有关, 同时又觉得我们还没到时间, 还写不出一本真正让人满意的文化大革命史。之所以要买这本书, 是因为它是香港出的; 之所以买了又不看, 是因为怕失望, 怕自己的心理期待落空。当然, 这也恰恰说明了我真的喜欢并看重这本书, 所以就把它一直摆放在那里; 觉得它有用, 总有一天会用上。

这一天要等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 而且希望似乎越来越渺茫。

但“还没到时间”这一点总是可以肯定的; 至少就我个人而言, 如此丰富的历史痕迹与群体经验都存留在个人身上, 你到底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 不是单纯的记述史实和个人经验, 而是在原因、性质、意义、历史观、现实感以及经验何以如此构成、我们为何成了如此这般的人上讨论文化大革命。就一个群体在信息的自由传播与交流中形成相对的社会共识(这种共识再反过来影响、制约着个体的认知活动)而言, 我们显然“还没到时间”。当然, 这里的“时间”

也就不再单纯只是一个时间概念。我相信有更多的人都在开展着这种研究，对他们来说，时间早已成熟，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还找不到出版的门路或根本就不想示人而已。而这，当然极大妨碍了某种社会共识在相互撞击、辩驳中的形成。

先说书名。我觉得“砸烂旧世界”作为书名很好。至少，它揭示出文化大革命中“文化”的含义：它不仅只是指某种观念形态的东西，还包括相应的物质形态，如建筑、衣着、饮食方式等等，而“文革”则必须把这一切都“砸烂”；其次，还给了我们一种乌托邦或理想主义的色彩感，而这种色彩感也就是对那个时代的时代感；最后，它让我们直接感受到那种文革式话语方式的独特魅力：不同于“革命”的“造反”，不同于“推翻”的“砸烂”。那是一种决绝的决裂态度，与过去的一切彻底决裂。

但副标题“文化大革命的动乱与浩劫”就不好了。这是一种定性式的文革语言。对谁而言的“动乱与浩劫”？民族？国家？党和国家的领导机构？广大民众？社会秩序？文化传统与价值观念？都包含在内吗？先为一场运动定性，先把历史上这么大、影响到亿万人、而且可以说影响到几代人的一件事说成是“坏事”，而且是绝对的“坏事”，里面的内容自然也就无法展开了，这就与“样板戏”里的人物一出场就须黑白分明一样，在这一前提下，我们当然也就无法对“坏人”展开认真的讨论。而且，常识已经告诉我们，这样的好坏事或好坏人之分只能限制在一个极其相对的意义上；一旦深入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意义”是无法进行这样的划分的，我们要记住历史的教训，但不能满足于如此这般的“秉笔直书、尊重历史”：告诉我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泽东发动的，而且周恩来、叶剑英、杨成武、肖华、刘志坚等人在推动文革、揭批彭、罗、陆、杨以及在宣扬林彪、江青上确实起了很大的作用等等。王年一先生在为这本书所写的“序言”中说，“有人创造出‘林彪、江青一伙的干扰、破坏这个公式，坏事都推到林、江身上。’伟华在其著作中坚决摒弃这一公式，不让林、江代毛受过。此书中的许多笔墨，正是一针见血地指出症结在毛。”但这难道还用、还值得去说吗？本身只是一个虚假的公式，一个伪问题，用得着去“一针见血”吗？说给谁听？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谁不知道这场文化大革命是毛亲自发动、直接领导的？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难道会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吗？这是一个需要、或用“事实”就可以说明了的问题吗？问一问当今的大学生，然后告诉他们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领导的，不能让林、江代毛受过，这有意思吗？说给那些起草有关文件的人物（即所谓的“有人”）吗？用事实告诉他们批判《海瑞罢官》、揭发“三家村”，打倒罗瑞卿，等等，都是毛的安排部署，那些人会听你这些话吗？他们难道还不知道在这些说法背后到底都是怎么一回事吗？

包括卜伟华先生的这本书为什么要有这样一个副标题，在书中为什么使用“江青的谈话无所顾忌，谁都敢骂，对周恩来她也敢公然指责……在座谈会期间，江青指责和否定了一大批电影和文学作品，对周恩来亲自抓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也进行了批评”（该书第42页）这样一些实在有失学术水准的语言，我们其实也理解，也知道作者为什么要这样说。但指出这些谁都心里明白的事实实在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也谈不上“秉笔直书、尊重历史”。诸如“也敢”、“公然”之类的话你可以用在江青身上，别人也就可以用在你身上；至于《东方红》，至少对我们这一代人来说，其在鼓吹个人崇拜与砸烂旧世界上所起的作用，恐怕远在那篇并不为多少人知道的《纪要》之上。

以上都是一些可说可不说的小事。

我只想说说读了这本书第一章后的一些感想。

首先应该承认，确有惊心动魄之感，看到这些“内部材料”第一次以正式出版物的形式公布出来，还是让人放不下手。比如1965年12月11日罗瑞卿一到上海即被软禁，“周恩来、

邓小平代表中央与罗谈话，向他说明了会议的一些情况及叶群对他的揭发。这对罗瑞卿来说，不啻为晴天霹雳，他感到痛苦和冤枉，当即要求去见毛和林，把问题说清楚。周恩来说：“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明确告诉他既不能见毛，也不能见林。”（第30页）

“你怎么这样天真，这样幼稚？”这句话不但表现出周的成熟、老练，更让所有听到这句话的人周身冰凉，不会再存有半丝希望。到罗跳楼自杀未遂，毛只说了一句“真没出息！”，叶剑英则当即吟诗一首：“将军一跳声名裂”云云（第37页注释）；更可见出与罗在一起战斗了几十年的“战友”们在此刻所表现出的成熟、老练。在京西宾馆批判罗瑞卿的主持人有三位：邓小平、彭真、叶剑英，书中只说彭真在力所能及的条件下对罗进行了一些保护，不同意无限上纲，未提邓与叶的表现，也可看出相比较而言，彭无疑也有天真、幼稚的时候。

像这样一些细节的记述，均可视为“曲笔”，让明眼人自己去想。

但有些地方，不妨假设另一种可能（事实上也是存在着另一种或另几种可能的，否则毛就不会显得那么忧心忡忡），让大家在更深的层次上寻求答案。比如，1961年1月，京剧名家马连良、裘盛戎演出京剧《海瑞罢官》，毛大加赞赏，还把马连良召进中南海亲自聆听唱段，说“海瑞是个好人，剧本也写得好”，“应该提倡学习海瑞这样的人”（第9页）；至少在逻辑上，当毛对阿尔巴尼亚的卡博和巴卢库说到关于批《海瑞罢官》一事时说，“开头写我也不知道，是江青他们搞的”，这话应该是真的，但作者却告诉我们对毛的这句话是不能当真的（第12页）。为什么？为什么到了1967年2月，大局已定，形势已经明朗了，毛却要说这样的假话？必要性在哪里？是为了更突出江青吗？还是他忘记了自己以前说过的话？对毛的话，自然不能句句当真，但毛对身边的护士长吴旭君所说的那段话：

“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作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

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所以我依靠群众，不能让他们再走回头路。”（第6页）

这段话该不该当真？是真话还是假话？如果是真话，那么紧接着的“为达到引蛇出洞的目的，《文汇报》11月30日发表了上海敬业中学高二学生马以鑫（发表时用的笔名马捷）批驳姚文元文章”（第16页）等等就应该视为一种策略了。作者说，“毛泽东捂住自己的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第65页）在此背景下，成熟、老练就几乎成为了生存的唯一要求。首先是党内特别是党内最高级的领导圈子里这种氛围、这种局面，这种心态，这种关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然后又怎么扩散到全党、全国，它恐怕绝非一个是否能“秉笔直书、尊重历史”的问题。

在摸不清真假，不知是冠冕堂皇的假话还是虚晃一枪的真话的情况下，我们看当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后，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最为有力的武器就是“把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区分开来，彭真当着毛的面也是这样说的；但《北京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却是彭真口授的；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时的“编者按”是周恩来、彭真反复审定的；彭真还指示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发表文章《从〈海瑞罢官〉谈道德继承法》，而且亲自修改，在北京市委书记处传阅。由政治家为学术把关，讨论的确是政治与学术的两分，这是一种把学术与政治区分开来的态度或做法吗？这种有些滑稽的局面难道英明如毛这样的人还不能一眼识破吗？关于道德继承法，彭真能比邓拓多知道多少？这个时候，谁

又把尚钺、齐思和、翦伯赞、翁独健这些所谓“学术人”的文章当真？——尽管这些人也已战战兢兢，基本上不敢说学术与政治无关的话了。

所以自毛以下，成熟、老练已成为一种自觉的要求，这里面几乎无真话假话、无学术政治之分。彭真可以问：“上海发姚文元文章，连个招呼也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原则到哪里了？”毛当然也就可以说“姚文元文章发表时，不敢告诉中宣部。中宣部是个阎王殿，告诉他就压下来了”，“彭真算什么，我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他打倒。”（第62、67页）

让我们假设：如果罗瑞卿在跳楼前写给妻子郝治平的信中没有“……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党永远是光荣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如果1966年3月17日（3月8日刚发生了邢台地震），毛在杭州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一个人侃侃而谈，说吴晗、翦伯赞等人是共产党员，也反共，实际上是国民党，说《人民日报》登过不少污七八糟的东西，没有马克思主义，或者只有三分之一甚至四分之一的马克思主义时，吴冷西去向彭真、周恩来承认错误并企图讨教时，彭、周二人不那么“经验老到”地把吴哄骗过去；如果毛对康生、江青等人在私下讲了那么多中央的问题，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并不那么快地就表态：彭真立即让北京市委书记处成立由刘仁、郑天翔、万里组成三人小组展开对邓拓的批判，而周恩来、邓小平又立即与彭真划清界限，说彭真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情况又会怎样呢？不可能发生吗？但作者似乎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值得注意的是，内容如此重要的谈话，他不向政治局或政治局常委提出，而向康生、江青等人谈出。笔者揣测，尽管毛泽东魄力很大，但在此时要在几位常委面前撕破脸皮讲话，他还是会感到底气不足的。”（第68页）

这种揣测可信吗？它的依据是什么？什么是在作者在这里所说的“底气”？是在毛心目中的力量对比？是毛在面子上还过不去，他是一个顾及面子的人？或者还有别的什么具体原因？

但它至少告诉我们，再“秉笔直书、尊重历史”，“揣测”总是免不了的，因为有许多许多的环节是靠“史实”或“史料”无法告诉我们的。

于是，我们就必须寻找到使“揣测”或“分析”成为可信的另一种依据。这种依据不在提供更新的史料，而在对史料的重新解读，在解读中发现那些来自生活经验的让人“确信”的东西，即对人物、事件的概念性把握。

这就涉及到了我对这本书最大的不满，就是它没有思想。

这是一本没有思想的文化大革命史。

什么叫“思想”？这里不去讨论定义；但“文化大革命”无论讲“文化”还是讲“政治”，甚至就讲“革命”，总得有“思想”。而这个“思想”，即“文化”与“政治”相互渗透，必须为“革命”服务或以“革命”的方式使之强行固定在一个方向、一个目的、一种价值标准上，这一整套的理论早就表述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这是一套相当成型的理论储备，或者说就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意识形态。文化大革命得以发动，从根本上说就是这套意识形态的力量。对那个时代的我们来说，足以动员所有的人都投身进去的话语权也只握在毛一个人的手中。无论是作者所提到的1961年前后，“文艺界、史学界出现了一片活跃的气氛。……展开了对清官问题、让步政策问题、农民战争问题、道德继承问题、美学与教育问题等问题的讨论”（第10页），还是毛在杭州政治局扩大会议以及与康生、江青等人的私下谈话中，所涉及到的其实都是一个“思想”问题，一个还要不要共产党的这套固有话语的问题。这也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罗瑞卿等人迅速缴械投降的根本原因。具体到如何认识苏共二十三大，如何理解

他所说到的“虚君共和”，如何看待知识分子、怎样解放年轻人、培养“自己的年轻的学术权威”等等，核心问题在面对知识分子对这套话语权的挑战时，为什么“必须进行文化革命，阻止修正主义”，对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毛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原因，作为一套说法，对毛的这些话，我们能不“当真”吗？要“当真”，就得有应对、有思想，以思想对思想。而不单单只把毛的话当成是“底牌不亮，说话留有余地，有时在关键的地方闪烁其词，语焉不详，有时又采取旁敲侧击的手法，常常令他的战友或曰对手们摸不着头脑，不知如何措手足”的策略性话语。离开对这套话语、这种意识形态的清理，“一针见血”其实也就是虚晃一枪、避重就轻。

金观涛先生在为这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写的“总序”，题为“世纪视野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但什么是“世纪视野”？文化大革命是不是就可以理解为对这一“世纪视野”的聚焦？

在雷蒙·阿隆的回忆录《五十年的政治反思》（新星出版社2006年版）中，阿隆先生曾概括出了他所经历的五十年（其实也就是这个世纪）中在国际舞台上所争论的四个问题；这四个问题也就是毛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与私下谈话中所表述出来的问题：

首先，就是市场经济与集中的计划经济孰优孰劣的问题。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统计数字或仅凭直观感受就能做出回答的问题，它后面涉及到科层、学位、体制甚至大学还要不要办等一系列问题；阿隆说，“在较高的层次上，西方与苏联争论的是双方各自体制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是人文后果。我举出社会的活动性作为例子。苏联制度是否比西方民主更善于提拔低微阶级的子弟呢？”这也就是毛反复强调“不要压青年人，让他们冒出来。戚本禹批判罗尔纲，戚本禹是中央办公厅信访办公室的一个工作人员，罗尔纲是教授。……把新生力量，如学生、助教、讲师、一部分教授，都解放出来。剩下一部分死不转变的老教授孤立起来。改了就好，不改也不要紧”（第64页）所表达的意思。“文革”时广大青年学生踊跃投入，至少也包含着这一方面的因素，就是为出身低微的人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机会。

其次，“世纪视野”下的争论涉及到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是否最后会殊途同归的问题。阿隆把这种“殊途同归”了的制度称之为“民主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它的立论基础是技术决定论，或者是生产决定论。阿隆说，“经济增长的每一阶段，都有利于某一种体制。苏联体制比较容易在起飞阶段建立起来。在已经工业化的社会里就没那么容易了。”当然，最为根本的问题还是我们是否接受这种盖然的进化论，是否认为生产力的发展（按人均国民产品计算）就会决定社会制度，是否相信历史有一个人类可以确定的“未来”。对这个问题的争论其实一直伴随着我们，文化大革命时是这样，现在仍是这样。

再次，阿隆说，“苏联的历史未来论，不太容易符合现实。虽然苏联的社会主义‘接替’资本主义，却又要‘追上’美国，但是经济增长的阶段与体制交接班，二者之间并没有平行的关系。为什么不发达国家非得走苏联的道路呢？既然皈依马列主义并没有历史的必然性，那么今后苏联人就得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去芜存菁，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确实优于西方体制，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如果说我们以前接受的教育基本是“皈依马列主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的话，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证明在“去芜存菁，洗净了个人崇拜的一切污点，确实优于西方体制，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这也是我们养成了只说“好话”、掩饰或抹煞不足的原因。因为我们必须证明我们在结果上比西方强（这一点又很容易简单化为单看GDP）。只要有关这种必然性和“不管在经济效能上，或是在人的价值上，都比西方体制强”这一点还未得到论证或还未得到证明，文化大革命就并没有得到理论上的清理。

最后，阿隆说，根本的问题还是“工业型社会是否都趋向于同一个目标呢？我在《奥古斯

特·孔德：战争与工业社会》一书中，指出实证论鼻祖天真的乐观。科学开发自然，使人剥削人变得不合时代，毫无用处。战争随神学与军事政权的消亡而消亡。今天，人们都在寻思，生产到底是为了什么？这样，意识形态的教条主义就要让位于思想。”（参见《雷蒙·阿隆回忆录》第359页）然而，由于这些问题都没有展开过讨论，由于这些问题显得如此空洞，似乎与文化大革命这场“动乱与浩劫”毫无关系，所以“思想”也就一直未能取代“意识形态的教条”。恐怕就是人均国民生产达到一万美元，“寻思”、“让位”、“取代”也提不到议事日程上来，而且，人们会以为文化大革命那一页已经永远地揭了过去，或者说，正因为不讨论这些问题，我们的经济才获得了如此的发展。于是我们就又回到了第一个问题：发展经济到底是为了什么？什么才是我们所要追求的“政治和社会后果，或者是人文后果”？

也许话说得远了一点，但我在阅读《砸烂旧世界》的第一章时，就如同在阅读一部侦探小说，一部宫廷秘史中的尔虞我诈。还是阿隆，在他这本书中说：“通过了解希特勒的野心和性格来理解他在1941年6月作出攻打苏联的决定，在我看来并不是一件难事，但是这样说也并无太大的把握。我认为，像解释一个血栓、一场暴风雨或一场地震那样来解释希特勒采取的决定，无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其存在的意义上讲，都是错误的。”（第644页）这对我们来说本来只是常识。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从社会关系、政治矛盾、阶级利益的角度去认识历史上的人与事，为什么当我们说到文化大革命时，这些角度都不存在了呢？

文化大革命确实是毛发动和领导的，这毫无问题；林、江就是想“代毛受过”，也没有这个资格。毛自然有他的想法，这套想法自延安一来就逐渐成型；为了贯彻他这套想法，不惜千百万人的生命，不惜与所有的革命战友撕破脸皮，不惜“重上井冈山”。这里面有真的，也有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不亮底牌、留有余地、闪烁其词、语焉不详。

但无论毛的想法在理论上多么自洽、完备，文化大革命一旦发动起来了，就又有它自身的逻辑，这种逻辑也是自洽的，而且不以任何人、甚至包括毛本人的意志为转移。

再说一遍：无论毛这个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与形成、进展多么起着决定性的作用，文化大革命毕竟是一场千百万人投身其间的运动，而且持续了那么多年。这千百万人并不仅仅只是一堆数字，其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而且不断改变着自己，在改变中寻求着认识时代、适应环境，有的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有的昙花一现，过眼烟云。在这中间，并不缺少思想者。那么今天回顾“文革”，除了对于一些人来说意在搞清楚某些事件、人物的来龙去脉外，对绝大多数认真思考这一段历史的人来说，他们关心的还是思想、理论上的清理，是为了寻求另一种解释，不但能认识“文革”，而且能认识二十世纪、认识整部党史，认识这六十年来理论变迁（再没有比文化大革命把一切都推向极端，更登峰造极的了），认识我们的今天。

再回到我在一开始所说的话：也许真的还没到时间。

但我也说了，这并不仅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米涅的《法国革命史》出版于1824年，距离法国革命爆发只有35年；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出版于1856年，距离法国革命也不过67年。

至于1968年的法国、德国、美国学生运动乃至世界范围内的另一种形态的文化大革命以及随后出版的研究著作就更多了；为什么爆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这场运动给那么多国家的思想界带来了那么大的影响，以至于我们今天仍在吸收着他们的思想营养，而在我们自己这里却只是一场“动乱与浩劫”？文化大革命时，全国人民都说一样的话，而且是发自内心的话；今天，当大家围绕着“民主好不好”、“中国能不能实行民主”还在争论不休时，

我们是否可以跳离这些概念之争，想想“文革”时，当大家都说着一样的话，进行着一样的、千篇一律的文字创作时，“自由”到底应该意味着什么不是一个很清楚的问题吗？

米涅在他的《法国革命史·导论》一开始就说：“国土分割成相互敌对的一些省份；人们分属于敌对的阶级。贵族虽然还保留着爵位，但已失去了全部权力；人民毫无权力；王权则毫无限制。由于王权横行，由于种种特殊的制度和各个集团特权的存在，法国陷于一片混乱之中。”以后，马克思说，他的有关阶级与阶级斗争的观念就来自这里。有了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个概念，整个法国大革命就都得到了说明。

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或者如这本书在“导言”的一开始所说，他是要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托克维尔最感兴趣的是“对当代进行思考与观察”；他说，“迄今我最擅长的，是评价史实而不是叙述史实”，特别是那些“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时代”。在时代中，他最为关心的又是制度，制度与时代的脱节。文化大革命难道不就是这样一段“独特的、甚至独一无二的”历史吗？但我们却对其独特性形不成任何概念。研究，对当代的思考与观察，对史实的评价，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来说是不是太遥不可及了？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的结合，说明文化大革命最深的根源就存在于我们以前整个的历史中，这难道不也是我们“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文理想吗？托克维尔自己在《旧制度与大革命·前言》中说，法国大革命有两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是摧毁一切（砸烂旧世界），第二阶段开始恢复部分已被遗弃的东西，“恰如某些河流沉没地下，又在不太远的地方重新冒头，使人们在新的河岸又看到同一河流”；他还说，他不但要搞清楚病人死于何病，而且要看看他当初如何可以免于死，于是他发现了正是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于是，在人没有任何家庭、种姓、阶层、行会、教会、家族的联系的情况下，人们就只有用从旧制度中继承的一切（封闭、孤独、对立）来摧毁旧制度，并“以旧制度的瓦砾来建造新社会的大厦”。

马迪厄的三卷《法国革命史》是我30多年前就反复看过的一本书。作者非常明确地说：写作历史与学识考证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前者是分析，后者是综合，前者意在收集史料，后者则是重现与表达，解释史实，用史实来表现它们之间彼此相连的关系及各种利益与力量所发生的作用。而他那对一段历史的概念性把握却集中在经济关系上，集中在国王（也就是国家）怎样才能把更多的钱集中在自己手中的问题上。

法国革命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但作为“史”，作为后人对过去的新审视，又有许多可比、至少也是借鉴之处；比如，就对史实的收集、整理而言，我们不可能再有卜伟华先生这样的条件与经历了，但，就对“文革”的研究而言，也许我们还没有起步，真的还没有起步，这是整个民族的悲哀。

阿隆曾对自己如何概括自己所经历的时代（包括二战在内，而且他就是一位犹太人），是应该称之为“悲剧性”还是“戏剧性”犹豫过。他说，当然，说“悲剧性”更恰当一些，但，如果我们在经历了那样的时代之后，发现它依旧不断出现，而且无论如何也设想不出一个另外的可能，“那么只有那时才能得出一个悲剧性的结论。”（《雷蒙·阿隆回忆录》第650页）对文革也一样：我们首先或一定要问一问自己，我们是否依旧或只能生活在“动乱与浩劫”之中？

也许，整个一套“中华人民共和国史”在体例上的统一要求使得这本书只能写成这个样子，但如果作者能意识到我们重现“文革”的目的是为了认识我们的时代，是为了使我们获得一个“二十世纪的视野”，那么史实的选择与解释就会呈现出另一种完全不同的整体上的联系。

我们依旧期盼着有思想（而不是只有史料）、有见解（而不是定性式的划分），能从概念（也

就是可推论，可建立起逻辑上的关联）上把握我们这个时代之“史无前例性”的“文化大革命史”。

编者按：陈家琪先生为同济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

## 【史学动态】

### 新世纪林彪研究述略（下）

• 余汝信 •

#### 二、研究专题概说

新世纪以来，林彪研究在其广度和深度上均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其中以下专题的讨论较为集中、热烈，有一些新的见解及新的突破：

##### （一）战争年代的林彪

新世纪以来有关战争年代林彪的著述虽然不多，惟著述者在立论上大多已较客观公允。研究者方面，彭红英、余世诚列举了林彪与毛泽东自1928年在井冈山相识后，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几次分歧，较为客观地指出：“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我们认为可作如下评说：林彪并非‘一贯紧跟’毛泽东，也不是‘一贯反对’毛泽东。其分歧多是革命队伍内部的意见分歧。这些分歧不仅没有伤害毛泽东与林彪之间的关系，反使他们愈加契合，应该说这是正常的。”〔14〕黄瑶对广为流传的辽沈战役中林彪背着罗荣桓发出回师长春电报一事，根据当时林彪秘书谭云鹤的回忆及《阵中日记》的记载作了辨析，否定了这一说法。〔15〕

谭云鹤回忆了1948年中军委令东野南下攻击锦州和北宁线时，林彪打锦州决心一度动摇，是因为“准备了一桌菜，却来了两桌客人”，后在罗荣桓提议下，给中央重发电报主张仍攻锦州，与中央意见再度一致的详细过程。谭还述及林彪口授电报的一般程序，以及对林彪近身的观察：“林彪的生活和警卫不归我管，但我从王本口里和我日常接触到的，觉得那时林彪的生活是很简朴的，很少听说他要穿什么，吃什么，房子冷了、热了。那时他的厨师是一位冀东人，政治上当然可靠，是个共产党员，技术上却不太高明，但林彪从来不说什么。”〔16〕

罗舜初自1940年代历任东北民主联军、东北野战军三纵政委，四野四十军政委、军长，军委海军参谋长、副司令员，国防科委副主任，沈阳军区副司令员，1955年授中将军衔。他的《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是经后人整理、于他逝世二十四年后发表的。该文对林彪有褒有贬，褒多于贬，由于罗舜初不被视为“林彪集团”中人，他的“褒”就显得有点儿引人注目。〔17〕

《吴法宪回忆录》对东北战场林彪功绩的肯定，尚不及李建国的《辽沈战役研究》。如东北易帅、林彪出任东北局第一把手，吴回忆录仅一笔带过，而《辽沈战役研究》则对此有多处精辟、独到的评价和分析。〔18〕

可惜的是，类似《辽沈战役研究》这样对战争年代的林彪有一定深度的理性分析和评价的著述，在本世纪头几年再未出现过。

##### （二）林彪与“罗瑞卿事件”



近年，由官方编纂的著述仍坚持认为，文革前夕发生的罗瑞卿事件，是林彪诬陷的结果，指1965年11月30日“林彪派叶群带着他的信和十一份材料坐飞机赶到杭州，单独向毛泽东作了几个小时的汇报。林彪诬陷的内容至少包括：罗瑞卿要夺取军权；罗一贯反对突出政治、反对毛泽东思想、存在单纯军事技术观点等等。”〔19〕

有论者不同意以上说法。该匿名论者认为：“在解释1965年12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打倒罗瑞卿原因时，均将其归为林、罗工作上的冲突，林彪担心罗瑞卿取而代之。而毛泽东似乎是无辜的，被迫接受了这个结局，因为他需要林彪在未来的斗争中支持毛，而不是刘，权衡利弊，只有保林舍罗。此为大谬也。尽管，林彪没能在打倒罗瑞卿一事上持公正立场（如同在打倒彭德怀时一样），但林彪绝非要打倒罗瑞卿，而是在得悉毛的态度后，对毛表示支持，并同意毛的安排，由叶群以林办主任身份代表林在会上做相关发言。”〔20〕

以上署名“佚名”的论者所言，较官方说法更符合逻辑，更言之有理，并非一般不了解内情者所能编造。“佚名”者想必有其可靠的消息来源，可能因某种原因未愿透露。惟要令研究者及后来人更心服口服，公布其资料来源应为上着。

### （三）林彪“五一八讲话”

对林彪“五一八讲话”，官方言论调子依旧。如《毛泽东传（1949—1976）》声称：“十八日，林彪在会上讲话，骇人听闻地讲了一篇‘政变经’。林彪的这篇讲话，使党内和国内的政治空气陡然紧张起来，使本已存在的个人崇拜狂热更加泛滥起来。”〔21〕

王力的回忆则较为客观：“十八日林彪讲话，讲政变经，这已经有全文，就不多说了。我们事先知道叶群到科学院等单位搜集中国历史上关于政变的资料。林彪为什么讲这个呢？是因为毛主席多次讲要防止在我国发生反革命政变。毛主席也同意了，划了圈，但毛主席背后说他不那么赞成。是跟江青说的。”〔22〕

余汝信著文详细罗列了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大半年时间（即从1965年11月至1966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毛泽东“没有睡好觉”而在“上层”采取了“防止反革命政变”措施，包括：一、更换中办领导人；二、整肃军事系统高层；三、加强广播事业局安全警卫；四、成立首都工作组，扩编北京卫戍区；五、撤销公安部队番号。余汝信认为，以上措施给我们的启示至少是：“其一，‘防止反革命政变’是在毛泽东本人督导下所做的一篇‘文章’。是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防修反修思维的具体实践。其二，‘防止反革命政变’的总决策者，是毛泽东本人。无可否认，林彪因其自身的利害关系，对此决策是积极响应的，但更不可否认的是，周恩来、邓小平，尤其是周恩来，也是积极响应，坚决贯彻的。说林彪一个人在念‘政变经’，完全不符合历史事实。”〔23〕

戚本禹2003年12月与余汝信谈及林彪“五一八讲话”时称：林彪“五一八讲话”，是周恩来要他讲的，林彪说：“常委的其他同志要我先讲”指的就是周。讲话记录稿先由中办的工作人员梁川作了初步整理，再交戚作进一步整理，因为林讲了很多历史上宫廷政变的例子，这些刚好是戚熟悉不过的东西，可得心应手地加以史料上的核对和文字上的加工。戚基本是按记录稿整理，没有作任何大的增删。林彪看过整理稿后十分满意，说戚是高水平的整理。〔24〕

### （四）文革发动阶段的毛、林关系

目前，官方言论仍称，“九一三事件”后次年才公布的毛泽东给江青的信，表明了在水文革发

动阶段毛对林彪的疑虑，所以，信中将林彪称为“我的朋友”，而且，信中毛称他一生中第一次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这个“别人”指的也是林彪。（25）

大陆学者何云峰则指出：“‘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基本态度是信任支持还是怀疑，大多数人长期以来一直倾向于前者。自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著一些文献材料的正式公布，这一看法遭到了不少研究者的质疑。一时间，‘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再度变得模糊不清。”（26）

何云峰认为，这主要是由于对这些文献材料的误读而造成的。关于毛致江青的信，何云峰认为：毛对林讲政变问题并没有不安，为毛所不安的，是林关于毛是天才的提法（不仅是跟马、列并列的天才，而且是超过马、列的天才），为此，毛专门委托周恩来到大连，向林彪讲了信中的内容，借此提醒林在宣传上不要搞得太过头，这本身就说明毛对林是信任的，另信中一句“我猜他们的本意，为了打鬼，借助钟馗”，不仅不足以说明毛对林的怀疑，反而说明了毛对林的信任，认为林这样做虽然有点过头，但心是好心，只是出于“打鬼”的需要而采用的权宜之计罢了。何云峰称：根据这两个文献材料断言毛泽东在文革发动阶段对林彪已有怀疑，其实是一种误读。

关于毛致江青的信真伪问题，陈小雅认为，这封信存在重大“破绽”，在指出可置疑之处后，陈小雅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1966年7月8日，确曾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1972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27）

戚本禹在答余汝信有关外间对该信真实性的质疑时则称：“可以肯定地回答你，有这封信，你可以看看这封信的字里行间，完全是毛的风格，而毛的风格，是任何人都难以模仿得神似的。江青收到这封信后，觉得应该在党内最高层部分人中传阅，得毛同意。传阅过程中，周恩来抄了一份，陶铸亦抄了一份。”（28）

其实，何云峰未有讲清问题的实质，这可能是囿于大陆的现实条件所致。通观毛致江信全文的风格，可以相信它是真的。官方1972年内部公布它的目的，是用以表明毛早就对林有非凡的洞察力，但适得其反的是，它给明白人看出了毛对林既暂时利用又加以防范的阴暗心态，是毛出于政治需要一定要利用林，而绝非林要利用毛。

#### （五）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过程

有关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的历史过程，大陆学者彭厚文认为：“众所周知，‘文革’前毛泽东对外宣布的接班人是刘少奇。但实际上，毛泽东在对接班人的考虑上，并不像对外宣布的那样简单。‘文革’前，毛泽东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外，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没有把刘少奇看成惟一的固定的接班人；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视野的，除了刘少奇，还有邓小平、林彪。而且，到了‘文革’发生前一二年，刘少奇甚至还被毛泽东摒除在接班人的范围之外，接班人人选只剩下邓小平和林彪。而在邓和林之间，毛泽东又更倾向于选择林彪。”（28）

高文谦则描述了1966年8月林彪被确立为接班人时的一些具体情节：“八月五日，毛泽东在下决定换马以后，首先把周恩来找去，把他刚刚写好的《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底稿拿出来交给周看，说：看来刘少奇是不行了，对他观察了二十一年，完全失望了；对邓小平观察了七年，也失望了。然后话锋一转，问周的意见。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自然顺势表示：那就只好叫林彪回来吧。这一提议，正中毛泽东的下怀。毛很高兴，当即拍板，并吩咐周按此

进行部署。随后，周恩来马上安排飞机把林彪从大连接回北京，并召集会议，分别向中央党、政、军各部门负责人打了招呼。这就是林彪成为接班人的大体经过。”（29）

#### （六）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

王年一、何蜀、陈昭著文认为：综观林彪在“文革”中的真实表现，林其实是一个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30）

王年一等认为：在毛泽东发动“文革”之初，林彪同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一样，也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的，对“文革”究竟如何搞法，也是完全不清楚的。高文谦在《晚年周恩来》中指毛对林、周、邓、刘四人的策略是“联林、拉周、整邓、倒刘”，林彪不过是被毛泽东“联”过去当了被借助的“钟馗”而已。

至于林彪成为观潮派、逍遥派的原因，王年一等认为有两个，一个是林彪的病，凭林的聪明和敏感，他不会不明白，毛选他这样的病人来做“接班人”，决不会象宣传上说的那样是因为他“高举”、“紧跟”，而只不过是便于一时的利用；另一个原因，或许是更重要的原因，是他对“接班人”地位的恐惧，明哲保身，既可免毛的猜忌，又可落得超脱，在政治上不负责任。

#### （七）林彪与“九大”政治报告

林彪事件发生两年以后，中共“十大”的政治报告说：“九大以前，林彪伙同陈伯达起草了一政治报告”，陈伯达起草的稿子，后来被指责为“鼓吹唯生产力论”。

林彪与陈伯达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过程中的关系，陈晓农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中作了比较详细的叙述。（31）

有关在起草“九大”政治报告时，陈伯达被指为“鼓吹唯生产力论”，与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被陈反击为“像伯恩斯坦说的运动就是一切，而目的是没有的”的激烈争论、冲突过程，陈晓农引用了王文耀、王保春在2003年3月出版的《中共党史研究》第2期上发表的《关于陈伯达起草九大报告的前前后后》一文，该文称：毛对陈“不能按期交出报告稿”，可能延误九大的召开表示不满，说，不行就重新搞嘛，请康生主持重搞。根据王文耀、王保春的文章，陈伯达的报告起草完后，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就被否定了。陈晓农说，陈伯达在同张春桥争论时，没有援引过任何“林副主席指示”来支持自己的观点，也说明林彪对起草九大报告没有表示过具体意见。

关于林彪同“九大”政治报告的关系，张云生称，叶群对他说：“老夫子的稿子，‘中央文革’不想再讨论。因为主席对张、姚的稿子已经亲自作了修改，说明主席对它已经基本认可了。但是老夫子还是不甘心，他坚持将它印出，托我劝首长好好看一看。说是首长看，实际上还得靠你们去讲，我是同情老夫子的，只能说首长已经看过他的稿子，这是给他的一点安慰。但是，你们给首长讲的时候，不能讲得太细，以防止首长的脑子一热，又对老夫子的东西发生了兴趣。”（32）

张云生说，林彪最初想搞个“平行作业”，准备一个“九大”上用的“条子”，但在毛泽东亲自过问政治报告的起草后，林最后决定不搞了。对张、姚写的东西，林彪始终不感兴趣，一眼没看，对陈伯达的稿子，林彪虽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却让张在“拉条子”时把它当作参考的素材。

张云生以上说法与陈晓农的说法略有不同。陈说陈伯达的稿子“没有给任何一个领导人看过”，张云生说陈伯达的稿子已印出交林办，林彪虽没有“看”过也不想知道它里面写了什么，但却让秘书看且将其当作参考素材。

#### （八）林彪与“第一个号令”

早于1980年代末，中国大陆学者苏采青即著文澄清：所谓林彪“第一个号令”与疏散中央领导人到外地以及下放干部到“五七”干校或基层单位这两件事，不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33）1994年吉林人民出版社的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亦较客观地介绍了“第一个号令”，作出了该“号令”并非阴谋活动的结论。

惟近年部分官方出版物，如官方编纂的《毛泽东传（1949—1976）》，仍老调重弹“阴谋论”，称“对这样一件牵动全局的大事，林彪竟在事先没有得到军委主席毛泽东批准的情况下，就自行作出这样的紧急指示，并立即向全军各大单位下达，采取行动。命令下达后的第二天，林彪才用‘电话记录’（急件传阅）的方式报告毛泽东。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不曾发生过的事情”。“林彪采取这种‘先斩后奏’的做法，确实是一件非同小可的事情。此例一开，就造成一种既成事实：副统帅可以不经统帅而在一夜之间调动全军进入临战状态。”（34）

张云生修改后重新发表的回忆录，专辟了一章即第十七章谈“第一个号令”问题，可视为有关此事的第一手材料。有关林彪指示的标题及向毛泽东报告一事，张云生说：“这个电话稿，我以‘首长让给黄总长去电话’作标题，将它的原件存在档案柜里。奇怪的是，总参作战部向下传达时，擅自加上了一个所谓‘林副主席的第一个号令’这样的题目，使它成为后来‘批林’的众矢之的。叶群与我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我将林彪的‘六条’传给黄永胜的同时，她负责将‘六条’内容报告正在武汉的毛主席。按叶群平时一贯注重突出主席的心态，她打这个电话的时间不会比我晚。”（35）

当年“第一个号令”的记录、整理、执行者——解放军副总参谋长阎仲川的儿子阎铭，2002年著文对阎经手“第一个号令”作了详细说明。（36）阎仲川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受到隔离审查，时间长达七年零六个月，1979年4月解除监管，1982年，一位总参领导才代表组织向阎宣布了审查结论。结论笼统地称阎在总部及此前在广州“支左”工作中犯有错误，只字未提“一号号令”，阎随即按正兵团职待遇离休。2002年6月22日，阎仲川病逝。

原广州军区司令部动员部部长迟泽厚，2003年亦曾著长文，对“第一个号令”发出前前后后的经过作了客观、理性的叙述。（37）

#### （九）九届二中全会上的斗争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军委办事组成员吴法宪等与张春桥等的斗争经过，在《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一书中，陈伯达作为参加会议的一个关键人物，对此有专门的回忆。关于林彪的讲话，陈伯达说：“在九届二中全会正式开会前，林彪单独和毛主席在一个房间谈话，周总理和我，还有其他人，在另一个房间等待，等的时不短。他们谈完出来后，大会开了。原定的议程是康生报告宪法草案的问题，并没有林彪讲话的安排，但林彪忽然抢先讲话，记得是讲关于宪草里写毛泽东思想的问题和关于天才的问题。林彪讲话似乎有一个拟稿，但语言无序。”“散会后，我去问林彪，他的讲话是否事先同毛主席谈过。林彪说，他的讲话是毛主席知道的。”（38）

作为当事人，吴法宪在他的回忆录中以大量的篇幅、专设一章描述了九届二中全会上与张春桥的斗争。斗争开始时，张春桥似乎一度居于下风，据叶群对吴法宪说，林彪在8月23日开幕式前，与毛泽东谈话，提及了吴法宪与张春桥在称天才、三个副词（“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地”）等问题上的争论，毛同意林“这个要讲一讲，要批评，但是不要点名”，吴法宪说，这就是林彪在开幕式上突然发表讲话的缘由。这个讲话的大体内容，毛泽东事先是知道的，而且也是表态同意的了。（39）

毛泽东是否如吴法宪所言事先知道并同意林彪讲话的“大体内容”？学术界是有分歧的。惟会议上吴等对张春桥的不点名攻击，却得到了与会大多数中央委员的支持，吴等未讲究策略，操之过急，引起江青、张春桥的极大反弹。更重要的是，军人们当时决未有料到关键时刻毛泽东对江青、张春桥的关爱之情，甚于对林彪的所谓“战友”之情！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如此这般对庐山的这场斗争进行了总结：“我们当时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毛泽东竟然会在最关键的时刻站在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一边。现在看来，毛主席本来就站在江青他们一边，是要坚决地保卫他的‘文化大革命’的。我们同江青等人在庐山上的斗争，危及到了‘文化大革命’，因此，毛泽东是决不会放过我们的。”（40）

#### （十）关于设国家主席问题

所谓“坚持要设国家主席”，是“林彪集团”主要罪名之一。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仍然坚称：“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41）

王年一、何蜀2001年著文对官方的论调提出了不同看法。该文称：中共党内高层有关“设国家主席”有不同意见，林彪并不是唯一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人；庐山会议上的争论以至毛“龙颜大怒”，并非源自于“设国家主席”问题，而是与会上许多人批评了江青集团有关；“林彪想当国家主席”之说十分可疑；毛泽东有关不设国家主席的言论不但算不上“英明指示”，而且完全不讲道理，十分霸道。“这实际上是毛泽东晚年错误的一次较为充分的暴露。”（42）

对于毛泽东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的官方说词，陈伯达在回忆时坚决加以否定：“哪里有这回事？什么说过六次不设国家主席，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毛主席说过，中国农民多，要设国家主席，可以让陈永贵当。”（43）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谈及了林彪在设立国家主席问题上的态度：“在要不要设立国家主席这个问题上，我想着重说一说林彪的意见和态度。林彪当即表示：‘我不当这个主席，这个不妥。应该是毛主席当国家主席，这才是名正言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没有国家主席，没有一个元首，这样名不正、言不顺。这个国家主席、国家的元首，只有毛主席来当，别人都不合适。但是毛主席的年纪大了，当国家主席要出国访问，别的国家元首来还要回访，毛主席出国有困难，可以设副主席，副主席可以出国对其它国家进行访问。我也不适合当这个副主席，我的身体不好，不能参加活动，不能出国访问。要设国家主席还是毛主席来当。’”（44）

关于国家主席设立与否的争论，一直延续到当年8月的庐山会议。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着重谈及了汪东兴在此问题上初始的态度，及“913”后吴交待叶群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这句话的由来：

“八月二十日，我约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程世清一道下山，一起去接中央和各省市来的人。程世清是东道主，我管飞机。我和程世清过去就很熟悉，所以在下山的路上他同我说起，

前一天他陪毛泽东上庐山，汪东兴对他讲：‘这次修改宪法，要坚持设国家主席，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毛主席怎么当我们的国家主席呢？不设国家副主席，林彪同志往哪里摆？’我听到这句话感到很高兴，我想汪东兴传的话，就是主席的意思吧。这一下，我感到心里更有底了。

“这里我要特别声明一下，过去很多文件及文章都说，这句话是叶群亲自对我讲的，这根本不是事实。实际上，这句话是我从程世清那里听到的，是汪东兴传来的话。叶群从来没有对我说过这句话。这是一个多年的冤案，我要在这里更正一下。这里当然我有一定的责任，但历史就是历史。当年在‘九一三事件’之后对我审查时，专案组为了收集林彪有“野心”的证据，千方百计诱导我，非要我把这句话安到叶群的身上。我开始拒绝了，后来迫于他们施加的种种巨大压力，就顺从他们，说了违心的话。但我在当时写的材料上，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忘了。如果现在还能找到我当时写的材料，就会看到，我当时特地在这句话下面做了记号。”（45）

吴法宪说，他对一些被逼出来的假话都做了记号，时至今日，倒是可以查证得到的。“吴法宪的亲笔交代”可见于当年大量印发的中共中央文件《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即中央专案组编印的《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证》。吴法宪亲笔交代的影印件原文为：“（二）七？年七月，叶群曾向我当面说过：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在“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九个字下边，吴法宪确实加了“•”的重点符号。（46）

#### （十一）“九一三事件”是毛泽东逼出来的

2004年，王年一、何蜀、陈昭合著的《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在海外引起颇大反响。文章引述了王年一1996年10月在一次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称：“‘九一三’事件是逼出来的，甚至可以说是毛制造出来的。”文章又说：“高文谦在蜚声中外的名著《晚年周恩来》中也用了这个‘逼’字，他赫然醒目地在小标题中用了‘把林彪逼上绝路’七个字，在正文中，这个‘逼’字又反复出现。真是不谋而合。”（47）

该文称，毛泽东是避着林彪南巡的。此次南巡共28天，约见各地军政大员，讲话13次，其中充满了给林彪上纲上线定性定罪的话。至此，事情已经没有转圆的余地，于是有了逼出来的“九一三”事件。

关于毛之南巡，丁凯文著文认为，毛泽东1970年8月的南巡与文革前夕在南方巡视隐居策划打倒刘少奇如出一辙。毛在南方接见各省市军队领导人时，将一年多前的庐山会议矛盾上纲上线到“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毛声称“有人急于想当国家主席”，“设国家主席”是反党政治纲领，“天才论”则是反党理论纲领。事实上，毛已将林放到自己的对立面，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48）

千秋在论及庐山会议之后的毛林关系时称：“他（指林）哪像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啊？庐山会议后，基本上独坐家中消极抵抗，唯一主动的就是想找毛泽东谈心消除误解。而毛泽东呢？又掺沙子又甩石头又挖墙角，多有点干劲啊！对林彪有意见当面不提，专程南下串联，背后嘀咕说尽林彪坏话。堂堂的主席，玩这种把戏，让人齿冷。这里面，谁光明正大，谁在搞阴谋诡计？谁要团结谁要分裂？还不明白吗？”（49）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则称：“看过毛泽东的这个‘南巡讲话’我才知道，原来我一直都被蒙在鼓里。在此之前我一直认为，是林彪、叶群、林立果在‘九一三事件’中跑了，我才倒的。直到看了这些谈话，我才相信了，就是没有‘九一三事件’，毛泽东也是决心要在九届三中全会上

把我们彻底拿掉的。他的这次南巡，就是在组织上和舆论上为彻底拿掉我们做准备。”（50）

## （十二）林彪对林立果的活动及《“571工程”纪要》是否知情？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坚持认为，《“571工程”纪要》“定稿后，曾由林立果连同有关政变资料带往并‘留在’已到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处。”“这些情况表明，为实现抢班夺权的野心，林彪等已走上铤而走险、孤注一掷的犯罪道路。”（51）又称：“九月五日、六日，在北戴河的林彪、叶群先后得到周宇驰、黄永胜的密报，获悉有人透露的毛泽东南巡谈话的主要内容。觉得自己‘末日’即将来临的林彪一伙终于作出疯狂的决定：要将毛泽东杀害于巡视途中，发动武装政变。”（52）

吴法宪在其回忆录专门一节“管不了的林立果”中，透露了吴对到空军以后的林立果的不满：“现在回想起来，林立果刚到空军时，确实比较老实，但是很快就在周宇驰等人的影响下变了，变得不知道天高地厚，胡作非为了。他背著空军党委、背著我，搞了那么多的活动。林立果的这些活动，我当时不知道。至于这一切的内幕我就更不知道。灯光烛影，千古之谜。这一切只有留待后人去查证了。”（53）吴法宪并没有提及林立果的活动与林彪有什么关系，更不用说得到林彪的支持了。

陈伦和1970年调入空军党办“调研小组”任外文翻译，该小组内部戏称自己为“小舰队”。陈在“小舰队”期间从未见过林彪和叶群，他还回忆道：“虽然和林立果在一起，他却从未向我透露过他欲谋害毛主席的‘反革命阴谋’或《“571工程”纪要》。我不知道当时庐山会议上毛与林已分道扬镳，也不知道什么‘选妃小组’、‘教导队’的事。我见到的他平时不喝酒、不抽烟、不讲究衣着外表，好象整天忙于工作和学习，平时还督促我学马列，记得当时批陈（伯达）整风的要求发给我《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六本马列的书，叫我认真学习我认为他是紧跟毛主席的。”（54）陈伦和的回忆表明初期的“调研小组”确是为掌握国外的军事、技术动态而成立，并不反毛。

陈晓宁著文集中反驳了当局指控林彪参与政变的各类证据，认为：“当局提供的这些所谓证据，要么本身就是错误的；要么仅靠这些证据还不能确凿无疑地得出林彪参与了政变的结论。仍然存在著这样一种可能性，即：被林立果、叶群利用的所谓的林彪参与政变计划的诸多证据，很可能是林立果、叶群打著林彪旗号编造出来的。所以，仅凭当局目前给出的那些证据，是不能充分地证定林彪参与政变的罪名的。”（55）

史学则对林彪与《“571工程”纪要》的关系甚至《“571工程”纪要》本身提出质疑：“历经30多年的反复查证，始终没有关于林彪授意和批准这个‘纪要’的直接证据。在林彪反革命集团中，至今也没有找到一个‘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证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仅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这些集团‘主犯’，没有看到过这个‘政变纲领’，而且，在所谓政变‘指挥班子’的所有成员中，也没有一个‘目击证人’。就连参加过‘机场密谋’的成员和被‘571工程纪要’列为‘保密范围’之内的所有活著的‘联合舰队’的成员，以及所谓‘分舰队’的‘上海小组’的成员，竟也没有一个有看到这个‘571工程纪要’。”“历经30多年的审查，我们不得不面临的是这样一个不争的事实：似乎死了的（指飞机上摔死的），都是‘571工程纪要’的目击者，而活著的，却没有一个人见过这个‘纲领’。”（56）

据说，《‘571工程纪要’》是“九一三事件”20多天后在空军学院“秘密据点”（将军楼）由王兰义发现上交的。舒云称：“2006年有人访问过李维信（笔者按：应为李伟信）。李维信说：最后收拾将军楼没有烧东西，他也没有在桌上发现那个写有五七一工程的红色拉链本。这就奇了，最后离开的李维信说没有红色拉链本。而在他们离开后第一个进去的王义兰却

是从将军楼发现的这个红色拉链本，这是为什么呢？

这里还有一个疑点：一般说，既然是草稿，就应该只有一份。要是按李维信的说法，《五七一工程纪要》应该在北戴河，为什么这个‘本子’却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的茶几上？是不是还有一个‘副本’？可是北戴河的所有文件都没有被带走，全留在了北戴河。为什么没有发现‘副本’呢？这说明，只有这一个‘本子’。那么，北戴河的‘本子’怎么出现在空军学院的秘密据点里呢？而且“赤裸裸”地放在李维信精心善后的屋子里，这如何解释？”（57）

### （十三）“南逃广州，另立中央”

官方《毛泽东传（1949—1976）》称：“毛泽东安全返回北京，使林立果等在途中谋害毛泽东的计划落空，完全打乱了林彪一伙的部署。林彪、叶群、林立果又紧急策划南逃广州，企图另立中央，分裂国家，宣称‘如果要动武，就联合苏联，实行南北夹击’。王飞（空军司令部副参谋长）等据此拟定了南逃名单，除林彪一家外，还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58）

吴法宪回忆录中没有涉及“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内容。吴法宪连林立果调动飞机一事也不知情，更别说“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了。吴法宪夫人陈绥圻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则称：“林彪对一些问题的处理，一向很慎重。林彪假如真要搞政变，肯定要跟黄、吴、要、邱他们商量，当然他也估计黄、吴、李、邱不会同意，所以他也不跟他们商量，也可能的，究竟怎么一回事，林彪已经死了，我们也无从证实。但是他（原注：指林立果），也确实想把黄、吴、李、邱弄到广州去，那是王飞说的。”（59）

余汝信著文根据“两案”审判对江腾蛟、胡萍及“小舰队”成员的庭审结果称：“所谓‘小舰队’，指的就是空军中以王、周、于、刘为核心的一小群中青年军官。其核心成员的思想体系及行动纲领，已充分体现在由于新野执笔的《‘571工程’纪要》之中。以今日的视角去阅读《‘571工程’纪要》，无疑可以发现其超越同时代人的、锐利的批判精神！从目前披露的材料观之，林立果及王、周、于、刘反毛的目标是明确不过的，但囿于当时的政治氛围，他们给‘舰队’其他成员所灌输的，恐怕只能是对张春桥、姚文元的不满（甚至还未敢提毛的夫人江青）。真正知道谋划的最终目的和真实意图的，正如陈绥圻所判断：‘王飞应该算一个，周宇驰一个，于新野一个，刘沛丰一个，可能了就这么几个人，他们的范围很小’。”（60）

余汝信该文引述了时任广州军区空军参谋长顾同舟及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对“南逃广州，另立中央”说法的驳斥：“顾再三申明：不知道南逃，绝对不知道。林彪出行，一般只是两架飞机。七八架飞机，那么大的举动，那是超历史的，不是我一个人能解决的问题。我可以负责任地讲，可以用人格担保，我对此一点也不知情，不了解，没有人通知我，也没有人打过电话。

至于大军区方面，《丁盛回忆录》披露了不少内情，丁盛所言：“我今天有责任说，我当时是广州军区主要负责人之一，我是司令，刘兴元政委，孔石泉，任思忠，他们都是政委、副政委，还有其他的人，所有的人，都不知道。绝对不知道！林彪南逃，他怎么想，这个我们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61）

余汝信最后说：“《‘571工程’纪要》无疑出自于‘小舰队’之手。在《‘571工程’纪要》中，‘小舰队’视上海为行动基地。‘南逃广州，另立中央’是‘小舰队’核心成员非常仓促的临时决定，未及付诸行动便已夭折。从目前已公开的材料来看，‘小舰队’打着林彪的旗号，但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林彪（以及叶群）事前知道‘小舰队’的计划，更不用说同意他们的计划了。根据现代法学‘疑罪从无’及‘疑点利益归于被告’的原则，所谓‘林彪又阴谋



携带黄永胜、吴法宪、叶群、李作鹏、邱会作等人，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指控，不能成立。而更无任何证据表明，黄、吴、李、邱以及广州军区、广州军区空军的领导人知晓‘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62）

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63）和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64）均称，“九一三事件”后张春桥等人曾逼迫广州军区副政委兼湖南省军区第一政委卜占亚承认，9月12日零点在长沙接到林彪“南逃广州”的通知。由于卜占亚的伪证，林彪“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罪名变得扑朔迷离，几被坐实，至今未得澄清。

#### （十四）“九一三”之夜（1）

关于“九一三”之夜北京及北戴河、山海关机场的情况，上世纪末《中华儿女》杂志发表过原林彪警卫秘书、总参办公厅警卫处副处长李文普及林彪专机组成员康庭梓的回忆，近年，又见有当事人吴法宪、林立衡及康庭梓更多的回忆，吴、林、康的回忆，均可视为北京、北戴河林彪住处及山海关机场三处事情经过的第一手材料。

吴法宪在回忆录中称，9月12日夜间11时，周恩来突然来电话问是否有调飞机到山海关机场，吴对此十分茫然，一无所知，经询问空34师，方知三叉戟专机被胡萍调到山海关，再询胡萍，胡解释是飞机改装后试飞，吴令立即飞回并复电周恩来，周指示，飞机返回时不准带任何人到北京。周为何如此紧张？他是否还知道了些什么而没有向吴透露？

为进一步追查专机调动问题，经周恩来同意，9月13日凌晨零点左右，吴法宪从城内空司直接去西郊机场，其实，周恩来此时已要控制“副统帅”的行动自由！

吴法宪回忆道：“我到西郊机场时，胡萍还没有回医院，正在和空三十四师的龙副参谋长谈话。见到我，龙副参谋长就走了。接着，我问飞机调动的情况，胡萍说的还是和电话里说的一样。正在这个时候，周恩来又打电话到西郊机场，告诉我说：‘林彪已经和叶群、林立果乘车离开了北戴河，车正往山海关机场方向开去，临走的时候还开枪打伤了警卫人员。’

“接到周恩来的电话，我顿时感到问题严重了。我估计，车从北戴河到山海关机场，需要个把小时，我就要秘书张叔良打电话到山海关机场，找到三叉戟飞机驾驶员——空三十四师副政委潘景寅。我在电话里命令潘景寅：‘要绝对忠于毛主席，飞机绝对不能起飞，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当时在电话里，潘景寅满口答应。”（65）

如果吴法宪的记忆无误，潘景寅的角色和立场却是值得深究的。否则，为什么他一边“满口答应”不起飞，一边最终还是起飞了呢？或许，事情本来很简单且令人容易理解——吴法宪的“命令”如何比得上在现场出现的活生生的“林副统帅”？况且，吴法宪在电话里也没有说明“不管什么人的命令都不能起飞”是谁的意思，毛泽东的？周恩来的？如林彪本人或叶群、林立果以林彪的名义命令起飞，潘景寅又能作何选择？

“但是，当我打电话把潘景寅的表态报告周恩来时，他却告诉我说，林彪、叶群已经上了飞机，而且飞机已经起飞了。这大约是九月十三日凌晨一点钟。周恩来要我注意看飞机的航向，注意它往哪里飞，降落在任何地方，都要报告他，他准备去和林彪谈话，我问周恩来要不要准备飞机。他说：‘你准备一下吧。’我当即要三十四师准备了两架飞机，因为随周恩来去的还会有警卫部队。

“我一直在雷达监视器前关注着飞机的动向，并随时向周恩来报告。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飞机一开始向西飞，然后慢慢转弯向北飞去。当飞机开始向西飞的时候，我要胡萍用三十四师指挥所的报话机，不停地向飞机喊话，命令潘景寅向北京飞。可喊了大约十五分钟，潘景寅

不作回答。这些情况，我都及时报告给了周恩来。

“当飞机飞到了赤峰附近的时候，我想到在赤峰附近有我们的歼击机部队，就问周恩来要不要把三叉戟拦截回来。周恩来说：‘这要请示毛主席。’过了一会儿，周恩来答复我说：‘毛主席不同意，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

“到九月十三日凌晨两点多钟时，周恩来又来电话问飞机到了什么地方。我说：‘已经快出国境了，离中蒙边界只有一百公里。飞机高度只有三千公尺，快看不见了。’很快，飞机就从雷达屏幕上消失了，我立即报告了周恩来，说飞机已经飞出国界，雷达看不见了。”（66）

#### （十五）“九一三”之夜（2）

关于“九一三”当晚北戴河林彪住处的情况，《林立衡九一三后写给中央的材料》应是可靠的依据。详情是从“9月12日下午5时左右”写起的，关于9月12日之前的情况，林立衡是否写有过其他材料，不知道。本材料对9月12日之前的情况只有小一段“我（指林立衡）从9月7日便分别找林彪的警卫参谋刘吉纯、李文普及林彪身边的两个卫生员陈占照、张恒昌谈话，其中和李文普谈的最多，因为林彪对李文普的信任超过了对叶群和林立果的信任。我让李文普注意观察情况，组织工作人员应付随时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特别要防止有人在林彪身上用药，一定要确保林彪神智清醒和人身安全。”（67）

刘吉纯曾对采访者称，9月7日晚上，林立衡对他说：“主任、老虎在外面做了坏事被上边知道了。他们怕挨整，在北京待不住了，想挟持首长（林彪）到外地去。我说，怎么办，是否去报告？她问，向谁报告？我说，只有向汪东兴、张耀祠、杨德中报告。她说，汪在庐山也受到了批评，现在对谁都不要讲。首长国庆节还要上天安门。现在离国庆节还有二十多天，等几天再说吧。当时我同她商定，她在里面，我在外面观察动静。”（68）

林立衡不报告，刘吉纯也没有报告，林立衡告之的其他人有没有报告？北京是否对北戴河的动静就毫无所知还是另有耳目？林立衡称等几天再说，于是，就等出了个“九一三”！

林立衡在材料中表露的最大不满是，在林彪、叶群、林立果出走的过程中，8341部队没有采取有效的拦阻措施，而更重要的是，林立衡认为，“这一切事情”的背后似乎另有目的：“姜副大队长等人气愤地告诉我，他们在先行车上一直等张副团长的命令，由于没有接到命令，他们不但没有进行阻拦，反而给红旗车让了路，直到张宏的小车开来才一起在后面追赶红旗车，但那时已追不上了。”（69）

关于以后在研究者中引起很大争议的李文普的枪伤成因，林立衡说：“很快，我听到距离很近的地方有一声枪响，接着又是一声枪响——后来听说是萧奇明中队长在大队部门口的哨位上用手枪朝汽车后面开了一枪，另一枪是李文普在离58号楼大队部门口约三十米处从红旗车上下来时枪走了火，李文普也因此受了伤。作为外科医生，张清林当着8341部队卫生员的面亲自为李文普包扎了左臂伤口。”（70）

而李文普本人在上世纪末著文的说法则是：在开往山海关机场的林彪座驾上，“车到56楼时，我突然听林彪问林立果：‘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林立果说：‘不远，很快就到。’汽车开到58楼时，姜作寿大队长站在路边扬手示意停车。”李称他听林彪说要去伊尔库茨克，便决心下车，大喊一声停车，司机杨振刚把车停下来，李立即开门下车，李转身朝58楼喊一声：“来人哪！”与此同时，李听到了车门响声和枪栓声，林立果就向李开枪。“当时距离很近，只一米左右，我侧着身，手扬着，所以子弹从前胸擦向左臂。”（71）

以后官方的各种出版物都引用了李文普的“证据”，以认定林彪为“主动叛逃”。但民间研

究者多为质疑李说的真实性。如李晨说：“反正汽车里的人全死了，他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一切都是‘死无对证’，连个‘旁证’都没有”，“‘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李文普一开始并没有揭发林彪在车里问过‘到伊尔库茨克多远，要飞多长时间’这句话，只是中央专案组将他单独关押，审讯时，他才迫于政治压力向纪登奎交代了这句‘关键性’的话，并改口说他的伤是林立果开枪打的。”〔72〕

#### （十六）256号专机坠毁原因

1971年9月13日凌晨2时半左右，林彪等人乘坐的三叉戟256号专机坠毁于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地区。专机坠毁的原因，是近年有关林彪事件讨论热点中的热点。

专机驾驶员潘景寅所扮演的角色与所持立场，是专机得以起飞的关键，也是至今悬而未决的一个疑团。康庭梓称：“午夜，时间的脚步刚跨入9月13日，潘景寅接到一个电话，然后马上用调度室电话通知海军场站要加油车。零时5分，潘景寅走出调度室，把睡在第三个房间的3位机械师叫起床”。康说，潘景寅自己不但不主动叫机组的其他5个人起床，而且，还阻止别人把他们叫醒。“有一点可以肯定，机组9人有走有留的局面是机长潘景寅直接造成的。问题是，潘景寅自己主动安排的，还是有人授意他这样做的呢？从各种迹象分析，潘景寅是在听了别人的授意之后，积极主动安排的。向他授意的人很可能就是林立果。”〔73〕

康文引述了1980年11月15日邓小平接见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总编辑厄尔·费尔时说的话：“据我个人判断，飞行员是个好人，因为有同样一架飞机带了大量党和国家机密材料准备飞到苏联去，就是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发现问题后，经过斗争，飞机被迫降，但这个飞行员被打死了。”〔74〕康庭梓的“分析”和邓小平的“个人判断”，说到底也都是一种推测，看来，康是同意邓小平的“个人判断”，惟这一判断与康所述潘景寅的举动相悖。

民间研究者于此各有说法，王年一、陈昭称：一种观点是林立果做贼心虚，要求“机组人员越少越好”；另一种说法来自张宁：林立果曾交代机场人员给飞机加满油，机上所有人员留机待命不准下机休息，但大部分人没有遵从；“还有第三种推测，那就是潘景寅等人可能领受了某种特别指令去完成一个‘伟大而神圣’的使命——必须使该机飞出国境，又必须以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代价使它坠毁。潘景寅会不会为了减少牺牲而故意这样做呢？”〔75〕

这真是一个大胆的假设！但是，缺乏了小心的求证。由于256号专机起飞后一直未与地面联络，飞机上的“黑匣子”（飞行事故记录仪）又下落不明，飞机坠毁原因缺乏直接证据。有别于官方渠道的分析，近年类似上述第三种推测的“阴谋说”和“苏联导弹击毁说”在部分民间研究者中流行。

“苏联导弹击毁说”以陈晓宁《质疑林彪“913”事件》为发端。陈晓宁该文得出的“9月12日夜林彪出走梗概”为“256飞机从苏、蒙边境边境调转机头，向中国返回？向中国方向飞行一段距离后，到达温都尔汗附近？苏、蒙方面在跟踪了256飞机的航迹后认为：此机既非迷航，也非叛逃，而是在有意利用民航飞机刺探完苏、蒙方面的防空雷达后想逃回中国。于是下令向其开火？256飞机中弹发生爆炸，并引起大火。飞机仍能飞行一段，只好盘旋寻找迫降地点，并带著大火进行迫降。由于火太大，256飞机已经没有时间进行盘旋以耗尽机腹主油箱的燃油了，所以只能带著2.5吨油用机腹着陆。飞机着陆时动作有误并且机腹油箱破裂引发大火，大爆炸，导致机毁人亡。”〔76〕继陈晓宁的文章之后，互联网上先后出现过的、持“苏联导弹击毁说”的文章有王年一、吴润生的《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77〕及京城孤魂的《是谁干掉了“256”专机？》。〔78〕

“阴谋说”似乎始于王年一、陈昭的《256号飞机是在空中先起火后迫降的》。(79)该文称：“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256号飞机空中起火呢？有人认为是被苏军导弹击中，也有人认为是被中国武器击中。除此之外，许多人（包括笔者）认为还有一个可能性是该机在起飞前安放了爆炸物，在空中的适当时机被引爆，造成飞机在空中起火。”持类似观点的是近年在互联网上发表的区区不才的《“不才”林彪913系列》，该系列文章认为256号专机急于带油进行野外降落，而且，从飞机起飞到此时刚好是2个小时，“原因只有一个，飞机上发生了万分紧急的情况，这个情况紧急到潘景寅在不到1分钟的时间内必须着陆，这个情况比带油降落、起火燃烧更危险”，因为中央早就洞悉了林彪一伙准备乘飞机外逃的阴谋，“而且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相关安排，林彪在逃亡途中机毁人亡就绝不可能是意外。”(80)

“苏联导弹击毁说”、“阴谋说”均为推测，缺乏有力的证据支持。

王海和孙一先的回忆录，则分别引述了“九一三事件”后由王海牵头组织的空军专家组关于256号专机坠毁原因的结论。(81)以目前持异议者所能掌握的资料来看，尚难推翻这一结论。

### (十七) 林彪的缺陷

吴润生承认，林彪是天才的军事家。惟“历史经验证明，凡军事家不宜从政，战争结束后就该退隐，如有新的战争发生方可东山再起。因为他们的血液中充满了军事家的基因，很难灌输进政治家的元素了。‘换血’的成功率极低极低，林彪同样未能超越这一规律。”(82)

吴润生认为，作为军事家的林彪，为什么不宜从政？因为他对政治和政治家有天然的偏见。此外，林彪对理论不屑，没有理论水平；对儒学矛盾，没有“禅让”、“礼让”、“谦让”、“退让”、“忍让”精神。真正具备政治家全才的人物比较罕见，显然，林彪不是。吴润生还认为，林彪在“夫妻恩爱”、“儿女情长”方面的缺陷是十分明显的，这也是葬送他政治前程的重要因素。

梁由之在《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83)一文中谈及了林彪不少优点，也列举了林的一些缺陷：1、不知自忌。2、不够谨细。3、器量偏于狭窄。4、两面派。5、心不够黑，皮不够厚。

### 三、简短的结语

记不得是谁说过，历史象一幅油画，你离开越远，就看得越清。这句话，适用于任何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同样，也适用于林彪和“林彪事件”。

近年，随着相关当事人的回忆录的相继出版，为林彪研究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一些久悬而未决的事件真相，终于有了逐步还原其本来面目的可能。诚然，研究者一方面应为这些回忆性史料的出现感到高兴，惟另一方面，却应在使用这部分材料时有着科学、求实的态度，认识到回忆录作者所处位置和角度的局限，与其他史料多作对照、比较。

进入新世纪后，在对林彪、林彪事件的研究上，虽然研究面已有所扩阔，研究专题有所增加，研究质量也有所提高，但仍存在相当的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在对林彪生平的研究上，相当部分的时段还是空白，至今，尚未有一个准确、详尽的林彪年谱出现；不少专题的研究，由于档案材料未能开放，仅局限于对仅有的一星半点公开材料表层性的反复“榨取”，难以进入深层次的挖掘；由于研究理论和方式的狭窄，制约了研究水准的进一步提高，以至所谓“林学”离真正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还有很长一段距离。其实，“林学”尚待解决的课题是大量的，例如：

对林彪军事学术思想尤其是中共建国后战略思想的研究，对林彪军事实践尤其是解放战争阶段军事实践的研究，对林彪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思想的研究，对林彪处世哲学、个性缺陷方面的研究，对中共建国后毛、林关系演变的研究，等等，更不用说诸如文革中的林彪真实一面，“九一三事件”真相，尚有大量仍未真正揭开之谜。

我们仍须努力！任何历史真相，总是难以完全、绝对地还原，惟经过努力，接近真相，将其基本面揭晓、还原，应该还是可能的。求索的前路艰辛而充满挑战，而这，恰恰正是解开“林彪密码”过程的引人入胜之处！（2007年3月）

注释：

- 〔1〕张云生、张丛坤著：《“文革”期间，我给林彪当秘书》，前言，页3—4。
- 〔2〕心远：《推倒在林彪头上的不实罪名——林彪研究专家丁凯文答问》（纽约：《多维时报》2004年7月30日）。
- 〔3〕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24。
- 〔4〕同〔3〕书，页231。
- 〔5〕孙一先：《在大漠那边：亲历林彪坠机事件和中蒙关系波折》，页41，365。
- 〔6〕王力：《王力反思录》，页940，943。
- 〔7〕以上及以下引文，见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275，321，329。
- 〔8〕廖汉生：《廖汉生回忆录》，页262—263。
- 〔9〕2006年3月访问林立衡谈话记录。
- 〔10〕徐景贤：《十年一梦》，页193。
- 〔11〕陈晓农：《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封底。
- 〔12〕同〔11〕书，页378。
- 〔13〕吴法宪：《吴法宪回忆录》，页788。
- 〔14〕彭红英、余世诚：《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与林彪的几次分歧》。
- 〔15〕黄瑶：《对辽沈战役中两个有争议问题的看法》，及见本书何海《近十年来关于战争年代林彪的研究》。
- 〔16〕谭云鹤：《辽沈、平津战役时我给林彪当秘书》。
- 〔17〕罗舜初：《我所接触和认识的林彪》。
- 〔18〕李建国：《辽沈战役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第一版），页98，103，104。
- 〔1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传（1949—1976）》，页1399。
- 〔20〕佚名：《毛泽东、林彪与“打倒罗瑞卿”》（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文革博物馆通讯（163）》，2003年2月10日）。
- 〔21〕同〔19〕书，页1412。
- 〔22〕同〔6〕书，页592—593。
- 〔23〕余汝信：《林彪“五一八”讲话前后的防政变措施》（电子杂志：《枫华园》总第436期，2004年2月6日）。
- 〔24〕〔28〕余汝信：《与戚本禹面对面》（电子杂志：《枫华园》总第432期，2004年1月9日）。
- 〔25〕同〔19〕书，页1421。
- 〔26〕何云峰：《“文革”发动阶段毛泽东对林彪的态度辨析》。
- 〔27〕陈小雅：《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真伪辨》，《重审林彪罪案》，页614—620。
- 〔28〕彭厚文：《“文革”初期毛泽东为何选择林彪为接班人？》。
- 〔29〕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页130—131。
- 〔30〕本节内容详见王年一、何蜀、陈昭：《林彪是“文化大革命”中特殊的观潮派、逍遥派》。
- 〔31〕同〔11〕书，页355—366。

- (32) 同(1)书, 页467。
- (33) 苏采青:《关于林彪的“第一号令”》(北京:《中共党史研究》1989年第5期)。
- (34) 同(19)书, 页1564—1565。
- (35) 同(1)书, 页568。
- (36) 阎铭:《我的父亲与“一号号令”》(济南:《老照片》第24辑, 2002年8月)。
- (37) 迟泽厚:《“一号令”发出前后》,《重审林彪罪案》, 页91—131。
- (38) 同(11)书, 页373—374。
- (39) 同(13)书, 页792—793。
- (40) 同(13)书, 页822—823。
- (41) 同(19)书, 页1567。
- (42) 王年一、何蜀:《1970年的庐山会议及毛泽东、林彪冲突之起源——在“设国家主席”之争的背后》。
- (43) 同(11)书, 页378。
- (44)(45) 同(13)书, 页777—778。
- (46) 中共中央文件 中发[1972]24号, 中共中央办公厅1972年7月3日印发, 页6—7。
- (47) 王年一、何蜀、陈昭:《毛泽东逼出来的“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
- (48) 丁凯文:《毛泽东的南巡与倒林阴谋》,《重审林彪罪案》, 页254—266。
- (49) 千秋:《倾听历史的声音——千秋评林彪事件》(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61)》, 2005年10月18日)。
- (50) 同(13)书, 页860—861。
- (51) 同(19)书, 页1592—1593。
- (52) 同(19)书, 页1599。
- (53) 同(13)书, 页852。
- (54) 陈伦和:《也谈〈林彪“小舰队”成员近况〉——当事人陈伦和自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531)》, 2006年10月4日)。
- (55) 陈晓宁:《林彪参与谋杀毛泽东阴谋的罪名之证伪》,《重审林彪罪案》, 页323。
- (56) 史学:《林案的玄机和蹊跷》(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27)》, 2005年4月6日)。
- (57) 舒云:《林彪事件完整调查》, 页397—398。
- (58) 同(19)书, 页1600—1601。
- (59) 凤凰卫视“鲁豫有约”: 吴法宪的夫人——陈绥圻, 2004年7月17日。
- (60)(61)(62) 余汝信:《林彪“南逃广州, 另立中央”罪名考释》(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78)》, 2006年1月18日)。
- (63) 迟泽厚:《卜占亚上下“贼船”记》(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77)》, 2006年1月17日)。
- (64) 舒云:《广州军区不知道“林彪另立中央”》(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469)》2005年12月6日)。
- (65)(66) 同(13)书, 页863—864。
- (67)(69)(70) 李晨:《世纪风铃》, 页237—250。
- (68) 丁丑:《北戴河林彪驻地警卫人员刘吉纯口述——林彪出逃前夜》《林彪·军队·文革》网站, 913亲历者言专栏。
- (71) 李文普:《林彪卫士长李文普不得不说》,《中华儿女》1999年2月总第108期, 页18。
- (72) 李晨:《世纪风铃》, 页254—255。
- (73)(74) 康庭梓:《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前》,《中华儿女》1999年第4期总第116期, 页34—39。

(75)(79) 王年一、陈昭：《256号飞机是先起火后迫降的》，《重审林彪罪案》，页487—488。

(76) 陈晓宁的《质疑林彪“913”事件》首发于2001年10月2日出版的电子杂志《枫华园》特刊总第32期，后刊载于2002年1月21日出版的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118)》，并收入丁凯文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

(77) 王年一、吴润生：《苏联导弹击落林彪座机》(电子杂志：《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118)》，2002年1月21日)。

(78) 京城孤魂：《是谁干掉了“256”专机》，《强国军事纵横》网站，2005年1月17日。

(80) 区区不才：《“不才”林彪9·13系列探微》，《林彪军队文革》网站，林彪事件专栏。

(81) 见王海：《我的战斗生涯》页231—234，孙一先：《在大漠那边》页275—278。

(82) 吴润生：《林彪与文化大革命》，页280—310。

(83) 梁由之：《百年五牛图之五：关于林彪》，《林彪·军队·文革》网站，军队与文革专栏。

□ 原载《百年林彪》 明镜出版社 2007年11月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胡海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邮箱：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